

从文化自信的角度理解儒家思想

——学习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论述*

张宏斌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系列论述和讲话，从文化自信来看儒家思想，笔者有以下几点理解和认识。其一，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其二，儒家思想是建构当今主流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其三，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文化自信 儒家思想 习近平 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 张宏斌，哲学博士，宗教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①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则谈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②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中共十七大报告谈文化，重点在“文化繁荣”；十八大报告谈文化，集中在“文化软实力”。与繁荣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主要是指与物质产品相对应的精神产品，其所关涉的是文化产业问题。与“软实力”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主要是指被作为“权力”使用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叙事，其所关涉的是国际政治领域里话语权的博弈争夺问题。

十九大报告里面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③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

* 本文借鉴了作者主持的中央社院课题 ZK20170408 “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部分内容，以及作者论文《儒教重建之文化向路的思考》（《儒道研究》第三辑，2013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特此说明。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出，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要点之一是“文化自信”，并且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信之对象、复兴之依凭的文化，是古圣先贤和革命先行者关于生活生命的信条和智慧，是五千年苦难辉煌所成就的山河岁月、故国家园。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①他同时又说“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②在这里，文化概念的使用推进到了文化哲学的层次，获得或者说被赋予了文明的意涵，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一、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主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子亦曰“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三代以上，治出于一”，三代之治，三代之史，大都合而言之，其意在于标明三代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连续体。三代的礼乐文明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覆盖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典籍记载，仪礼则有冠、昏、丧、祭、燕、射、朝、聘等，曲礼则有事亲、事长、起居、饮食、容貌、辞气之法，制器、备物、宗庙、宫室、衣冠、车旗之等。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教育、社会风俗习惯乃至饮食、洒扫、应对、进退等无不赅括。《礼记·坊记》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正义》曰“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是也”。《左传·隐公十一年》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古人之言表明了“礼”经国济民的原则、标准以及基本的社会功能。

雅野、风俗、朝觐、聘问、宫室、郊庙、衣服、饮食无不在“礼乐文明”的涵盖之下。礼乐文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代表，凝聚了人们的共同信仰，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价值原则，形成了一种自然的生活常态和精神积淀。如果说礼乐制度诚如欧阳修所言三代以上是治出于一，政治本质上自然形成了一个信仰的共同体，礼乐融入社会、政治、乃至人事的方方面面，合洽一如，无有明显的分野的话；那么进于周末，礼乐文明分崩离析，制度层面涣然冰消，文化、学术诸子蜂起、百家竞鸣时，事实上也正如先贤所言，治出于二了。“治出于二，官师政教不合于一”，“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③气数之出于天者，自然是无法回转的，君师两分，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灿然两分，政治与宗教泾渭之线渐明。

在纷乱的战国争雄之后政治由秦完成了统一，而文教秩序则是无法顺利达成。尽管秦王以吏为师，焚书坑儒以图达到文化与政治秩序的合一。但是秦朝的施政以及方式则完全是不能让人接受，“利禄官爵，抔出于兵”，一切都成为军事的附属，“燔诗书而明法令，别黑白而定于一尊”，以权力为中心而强力推行政令，“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事事不法古，而取“政”出一切。不止于此，秦朝的文化与政治合一的暴力强制与一以贯之礼乐文明主体精神背道而驰，李斯所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诚然是不错，然而其精神与秦则是截然相悖。秦朝施政之目的在于“恣睢其志，拏使其民”，以民为

①②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 年 9 月 24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上》，中华书局，2004 年。

虜，而礼乐精神之真谛在于“民为邦本”，“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任何的政治制度和治术都要以此为归旨，背离其宗旨的秦朝是个短命鬼情理之中。

而后的汉朝则一面“收孤秦之弊”，在秦朝所奠定的新体制的基础上，不只收孤秦之弊，而且也继承秦的大量遗产；另一方面“承圣王之烈”，来建立其正统的合法性以及渐渐恢复礼乐制度^①。汉朝所建立的礼乐制度并不是三代意义上制度的翻版，它顺应时代重新建立了礼乐形式，而在精神也能贯之一脉相承的主体精神。礼乐制度在周末轰然崩塌之后，诸子百家各持一说，但基本关怀都在建构新的人间秩序，非纯知识学术的关怀。有的推崇尧舜禹三王，以夏道为学习对象，这是墨家。有的鄙夷三代的权力政治，遥想伏羲、神农时代的自然无为下，人的纯真生命，这是道家。有的认为时易世变，古圣王不足法，因应新时代，主张尊君卑臣，依法而治，建立更严密的政治社会体系，这是法家^②。儒家则是向往古代圣王之制，尤其倾慕周代礼乐，乃以尧舜以夏商周三王为张本，又聚焦在周代的旧有封建秩序上。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言道“从孔、孟、荀到汉代，儒教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秩序。孔子以前的中国大传统是所谓三代的礼乐，即《论语为政》所说‘周因于殷礼，殷因与夏礼’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在春秋时代已陷于‘礼崩乐坏’的局面，但仍然向往周代盛世的礼乐秩序；他一生最崇拜的古人则是传说中‘制礼作乐’的周公。所以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是孔子深知礼是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必然有所损益，“从周”也绝不是理解为完全恢复周公的礼制，从其或继周者，百世可知也的话来看，他不过是主张继承周文的精神以推陈出新而已。他理想中的文化秩序是“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显然理想秩序是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是继周而加以损益之所在^③。一儒家方面承继了礼乐传统，整理了古代经典；另一方面又在承继与整理之际将一种新的精神贯注于旧传统之中^④。这种文化理想的实现在董仲舒时得以实现。

汉朝重新建构的儒教体系一方面为现实统一作出了理论奠基，为统治者所接受，并大力广之，反促进了这种文化的承传；另一方面，以三代损益一以贯之的“道”灌注自己的理想王道，既约束了统治者又为自己的理据树立了标杆权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布满了张力，为合理的理想的政治文化秩序点出了通途，开辟了政治与文化，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合理运作和平衡的蹊径。可以说，儒家承载和传承了以六经为主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民族精神，是天下国家观念和社会有序秩序建构的源泉。如果说，三代积淀，中华文化必然产生了儒家，那么可以说，而后的中国却是由儒家产生的。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从这绵延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儒家与其他学说校短量长，切磋琢磨，砥砺共进，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① 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273页。

② 参见王健文主编《政治与权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

③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④ 同上，第87页。

二、儒家思想是建构当今主流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019 年，教育部举行发布会，教育部教材局介绍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及教材的修订情况。在课标方面，各学科课标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等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开始进入国民教育的序列，意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再停留在口头、或是表面，而是切实践行、浸润身心的知行合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革命文化的实质就是红色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的红色气质发表讲话，强调，“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保证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红色文化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什么是红色基因，什么是红色传统，就是“不忘初心”的“初心”，和“牢记使命”的“使命”。近代中国人民开展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无数仁人志士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其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救民。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讲人民的幸福就是执政的目标和责任。就是在对外争独立的任务完成后，建国大业完成后，救国党成为执政党，人民的幸福成为权力使用的目的。所以，十九大报告说，“我国是一个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中国梦是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具有涵摄性，而不是排斥性的，就不是从阶级去讲了。尊重历史的连续性也就是在建构历史的整体性，也就是在扩大自己的历史基础。在社会多元、地域广阔的中国，从整体上协调把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早在 1940 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新中国的文化纲领，即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依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取得丰硕文化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①。时至今日，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浓缩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干，在其他学说齐头并进的过程中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陈寅恪先

^① 徐茂华 《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人民日报 2017 年 04 月 28 日。

生曾说，“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为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①”。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由于儒家周官之说采入法典，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的体现，两千年来，儒家影响最深最钜者集中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等层面。至于今日，虽然随着君主制制度的瓦解，儒教体系不复存在，民间的传统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护持了儒家的传统，而且儒教作为一套文化思想，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思维方式、感情状态之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物、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三、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同鼎之三足，缺一不可。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其核心要素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的逻辑。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华夏礼乐文明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者，能够代表或者作为全民族的精神信仰和价值依归。在三代礼乐制度崩解，现实离乱、秩序失范，“道术将为天下裂”，诸子蜂起时，着力思索新秩序、制度的重建，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接续历史文化传统，损益三代文明以承道统精神之所在。天下一统，有序国家政治、文化秩序的建立正来源于以六经典籍为代表的三代损益的历史文化所传承的精神和信念。现实政权合法性以及政治运作模式的有效性、合理性落于此层面之下。承载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是千百年来所自然形成的一种文化文明体系，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常态，它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主体精神和民众的心理精神积淀，早已熔铸在人民、民族、国家的方方面面以及心理、习俗之中。

而儒家之所以屹立千年、生生不息，正在于时移世易则备变，适应时代以自我更新和调适，能够化解各种异流冲击、同化各种资源，并将其导化入礼乐文明的大系中来。诚如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

①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83页。

②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

儒家学说以及在君主制时代所确立起来的礼法等制度随着帝制的崩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余英时先生认为，曾经支配着日常的社会生活；一切人伦关系的儒家规范，1949年之后被改变了，时至今日，大陆上中年以下的知识分子都已没有作为儒家文化参与者的经历了。不仅如此，即使在台湾地区，书本上的儒学也远远超过生活经验中的儒家价值，实践的层面日渐暗淡，儒教几成“游魂”^①。杜瑞乐先生则以为，旧式的儒家实践，无论是礼仪方面的还是身体践行层面的，事实上都转变成了某种抽象的诉求，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人们仅在口头上认为它很重要；可究其实而言，它却成了某种次要角色，几乎无关紧要^②。一言以蔽之，无论如何言说和批判，儒家以及儒家思想都不得不面临着现代性的问题。

正面应对危机，正视现代性的问题，使得儒家不是复兴的问题，而是重建的问题。西风东渐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境域之中，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以至于知识的分类、学科的分科等等无不有着西方的痕迹。无论是如胡适的西化派认为“我们样样不如人^③”，还是文化保守派所谓的“吾家自有”等等，都无法逃脱西化的影响，区别也仅在于主动的归化或是被动的适应。早期新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各自努力进行了回应。诸如梁漱溟是企图修补和拯救那个已经处于消解中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化，并与之一起进入这个时代；熊十力试图运用传统的慧识来回应人们在科技时代所遭遇的问题；牟宗三不仅了解现代的问题，而且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在理性的层面进入了现代等等^④。人们不自觉地陷入完全西化和现代性的泥淖，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民主与科学也好，道德主体转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开出“新外王”也罢，概莫能外。而今天重建儒教就是要维护自己的个性，给自己和自己的前途定位，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生活原则提供合法性依据^⑤——也就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而“根本”，“灵魂”，“本质”，“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这些都是在谈到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的关系时使用的措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⑥从文化自信命题的提出，到它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关系的确立，文化论已然实现了向文明论的拓展，文化、文明与国家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相依存，与国家、民族的生命历程相伴随，而道路、制度与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被开创、被选择、被总结升华，积淀深厚，潜力无限。

(责任编辑：李建欣)

①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② 杜瑞乐《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载刘东编《中国学术》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页。

③ 《胡适论学近著·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参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④ 郑家栋《牟宗三》，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0年，第58页。

⑤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

⑥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